

# 新形势下中国对外话语的新天下观 与国际传播的优化<sup>\*</sup>

李志凌

(云南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4)

**[摘要]** 面对当今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 中国的对外交往面临着一系列严峻挑战, 在对外话语、国际传播等问题上需有与之相适的措施。由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而来的新“天下观”, 以其独特的政治哲学视角, 为我们认清世界格局、处理国际关系打开了新的思路, 也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 为对话世界提供了框架式构想。“天下”观的理论精神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理念一致, 以实现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谐关系和携手发展为根本目的, 从国际关系治理入手, 以文明共生为目的, 将政治生活和文化关系作为抓手, 为我国的对外交流和文化传播设计出了系统化的工作格局和实施方案。

**[关键词]** 新天下观; 国际关系; 对外话语; 文化传播; 表达路径

**[中图分类号]** D80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2024)01-0107-10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24.01.011

## 一、引言

2023年6月2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在深刻分析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后指出, 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过程需要继续传承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的优秀传统, 强调了“两个结合”的核心作用, 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因为它们是实现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 也是应有的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讲话还特别提出,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 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sup>①</sup>这为当代国内政治文化生活和国际关系的理论建设树立了与时俱进的发展观和世界观。

联系当前实际, 中华文化的大发展不得不考虑新时代下所处的文化生态, 以及在这样的生态中如何生存和发声的问题。“生存”, 指的是一种文化的赓续发展, 对其自身文化的更新能力、自性特征的可持续及适应性形态提出了要求, 必须依靠文化蓄能及创新作为保障, 向内发力; “发声”, 是文化主体向外延展, 拓宽存在空间的主动举措, 是积极面对多元世界, 化解矛盾、融合适应, 并反哺自身的国家行为。在这样的认识下, 一方面需要与世界积极对话、有效交流; 另一方面, 要寻找本国文化同国际社会融通共生的渠道, 胸怀世界, 发展自我。这时, 以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基础, 讲求世界成员生存一体、前途攸关的和谐发展观、融合大局观应运而生。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理路相承, 是当代及未来国际生活中需要的新型世界观, 对一个文化主体的生存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能促使我们更加关注世界、融入世界, 追求天下和谐。这种新型“天下”观并非单一的国际关系学说, 而是在世界一体化认识前提下形成的系统性国际生存观念, 其理论核心源自中国传统的家国理念和人文情怀, 是顺应当代世界形势

\* [作者简介] 李志凌, 男, 云南昆明人, 云南民族大学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语言国际传播、文化典籍译介、英汉语言对比。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新时代国际中文教学资源助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创新路径研究”(23AYY026)。

①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N]. 人民日报, 2023-09-21 (009).

发展，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格局，具有宏观操作性的重要构想。以此观念为指导，符合我国对外交流的特点，也将在对外话语方式上提出新的要求，帮助我们有效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

## 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呼唤新型国际共生形态

如何认识今天这个世界？这种认识对我们的生存方式有怎样的启发？实际上，认识决定行动，为行动提供思想的保证；行动必须以认知成果为依据，同时验证、完善认知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 (一) 世界形势的新变化和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加大了对外交往的挑战

在提出行动理念之前，首先需要认清行动的场域特征，也就是所处的国际环境。201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提出，我们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并经历着“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理念。至今，党中央已多次在国际国内重大事件和历史时期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sup>①</sup>这是对世界形势做出的一个重要论断，也是认清国际环境，找到自我定位和发展出路的一把钥匙。

新冠疫情爆发以后，我们对世界“大变局”中的“大”和“变”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在面对人类重大公共事件时，世界体系会经受强大的考验，有时甚至表现得相当脆弱。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包括每一个个人，都无法独善其身。危难和机遇面前，人类命运紧密捆绑，共同体的生存现状和发展愿景都日益真实地自证于现实。

除了国际大势的卷流作用，近些年人们感受更多的还是世界秩序的动荡不安。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革。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了几轮重创之后，经济发展持续低迷，世界金融、贸易体系和投资环境变得愈加不稳定，甚至面临重组洗牌。原来以大西洋两岸为重心的经济格局，开始向太平洋两岸转移。俄乌战争、巴以冲突、东北亚危机、南海紧张局势等地缘危机转嫁为国际秩序的新型博弈和挑战。G7统领世界的格局逐渐式微，G20开始显示出更大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然而，一些传统的政治、军事联盟和文化势力仍然谋求圈子利益，排除异己，以不惜牺牲他国和未来前途的方式影响着国际秩序。少数国际社会成员退群、脱盟、解约，行逆全球化之实，令全球化趋势频频受阻，国际秩序屡遭冲击甚至破坏。少数西方主流权力机构以片面的“政治正确”和西方话语下的“民主自由”为幌子，控制舆论导向，操弄意识形态工具，阻碍了公众认知的公正性、客观性和全面性，致使自身的公信力散失，社会矛盾加大；在国家行为上，民粹主义思想有所抬头，上层建筑缺乏政策连贯性，言行不一，缺少成熟的政治理性和长远的务实理念，极端主义、孤立主义、分离主义开始大行其道。这些问题不断扩散、加剧，构成具有负面渗透作用的新型国际势力，对他国的生存空间造成了挤压。

相比之下，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日益突出，同时，面临的挑战也更加严峻和复杂起来。近年来，某些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核心科技和经济产业实行封锁、断供，借助疫情影响污蔑、损害中国的国际声誉，以媒体传播为武器，编造社会事件，扭曲事实，试图以人权、民主、法制等为借口围堵、抹黑、孤立中国，破坏国家形象，挤压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面对这些困难，我国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充分发展自身的经济实力，加强社会凝聚力，秉持着自强不息的毅力和发展决心，突破重围，努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现了全面的社会大发展。

### (二) 国际传播呼唤新的时代话语和战略转向

在202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中，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新时期面临的国际形势有清晰的判断，要求下大力气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以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sup>②</sup>从实际情况来看，当前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存在不小的阻力因素，国际传播形势严峻。

① 习近平. 准确把握世界军事发展新趋势 与时俱进大力推进军事创新 [N]. 人民日报, 2014-08-31 (01).

②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J]. 中国广播电视台学刊, 2021, (7): 1-2.

一是在某些西方舆论的误导和负面宣传下，我国的国家形象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国外不友好势力摆脱不了对华的长期偏见，总是担心中国的崛起会损害到本国利益，在中国议题上积极做负面文章，营造中国威胁论，不断挑战国际关系与合作的底线。有些官员公开宣扬与中国对抗、脱钩，动议各种制裁手段。西方统治阶层中弥漫的排华态度，不断撩拨着公众的敏感神经，加深了社会上下防华抗中的消极情绪，消弭了一部分同中国开展正常交流、积极互动的意愿和空间，对中国国际信誉构成了巨大压力，也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中国的声音，损害了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效果。

二是关于中国发展和国际形象的议程设置常处于被动局面。“西方媒体不断在涉台、涉港、涉藏、涉疆议题和民主、宗教、人权等领域进行话语攻击，施加舆论压力，成为我国国际传播的痛点与难点。”<sup>①</sup>在许多国际性话题上，西方媒体有传统且强大的影响力。一方面，媒体有传统的行业优势和深刻的社会地位。从工业革命时期开始，大众媒体就成为控制舆论的武器，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另一方面，西方媒体擅长制造社会话题，创造新闻事件，引导舆论，利用密集的舆论攻势引导民意震荡，甚至与某些社会公知合作，培植“消息人士”，左右地方及民间的文化意识流向。我方在这样的“麻烦制造者”身后回应被动，只能针对不利问题逐一化解，通过解释、正名、举证等方式来自证“清白”、矫正视听，最大程度地降低消极效应。尽管如此，这种“不在场”的话语者身份和“救火队员”式的工作方式，常使我们的传播事业处于劣势和被动局面，缺乏主动叙述和对话语交际内容的正向引领。

三是国际话语权同我国的综合国力、文化影响力、国际地位尚不匹配，发出中国特色的声音还很有限，传播得也不够远。随着中国在科技、经济、军事、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面进步，各方面成就中的本土元素含量越来越高，“中国制造”正实实在在地向“中国创造”发生着转变，不能完全借用西方旧有的概念加以贴标说明，这不但可能与事实不符，无法准确揭示真相，还可能自我贬低，局限了文化传播的价值。

以上问题构成了中国国际传播的深刻危机和现实挑战，我们只能转变思路，沉着应对，化危为机。怎样做到？寻找新的策略、更好的内容和有效的传播方式是首要方面，重点举措就是讲好中国故事：一是故事的内容取材，二是讲故事的方式；确切地说，也就是萃取具有时代意义的中国话题作为传播内容，采用新的国际话语表达方式。而这两个方面汇集到一点，就是要以国际表达的新型观念作为根本。

### （三）作为新型传播思想体系和国际话语方法论的“天下观”

当代一批国内学者从中国崛起与世界性影响的关系出发，将中国的发展同全球政治、经济、文化格局联系起来，提出“天下观”“新世界主义”“世界内部化”“关系理性”“孔子改进”等概念，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对国际关系做了全新探讨，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内涵做了突破性的诠释。这些开创性理论对我国对外传播思想的时代化发展及新型话语方式的探索产生了重要启示。

#### 1. “天下观”的哲学体系与国际关系

传统的天下观思想源于中国文化中的“天下”概念，是关于世界制度的一种设想，包含了“天人合一”“求同存异”“和合共生”“垂衣裳而天下治”（《周易·系辞下》）等思想，是一种朴素的普世主义，描绘的是理想的世界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道统中，“天下”主要是一个描述性（descriptive）的概念，指天空下的一切，也可以指称“尘世”和“华夏文明所及的世界”，是高于国家的一个世界集合体。除此以外，“天下”概念更重要的意义是它的规范性（normative），因为它同时隐喻着“所有人”和“（理想的）世界制度”<sup>②</sup>。新时代下形成的天下观理论体系承应了传统天下观中世界一统、成员有责的基本观点，正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此基础上，新型天下观中有一个明确的价值判断：中国应当为人类和平与共同繁荣做出新的贡献，其理想目标不是重建所谓的“中华帝国”，也不是在霸权论的角逐

<sup>①</sup> 赵丽芳，张灿. 走出困境与不足：新形势下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创新路径 [J]. 中国记者，2023，(6): 84-88.

<sup>②</sup> 赵汀阳. 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 [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41, 123-124.

中跻身新的“霸主”之列，而是在根本上改变霸权结构本身，最终促进人类走向公正与和平的“后霸权世界秩序”(post-hegemonic world order)。<sup>①</sup>

此外，传统天下观的内涵中更多侧重于社会性存在主体之间的系统联系，如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个人与世界的关系；而新型天下观不仅关注这些关系，还关注更为抽象的民族个体之间、文化形态之间、社会发展要素之间的多种联系，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大同观、系统观。这个观念试图勾勒的理想世界中，文化被视为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结合体，是在各民族文化之间相互对话、彼此学习中形成的。与此同时，理想的多元文化关系中，矛盾性是不可排除的，甚至是必要的。因为每一种文化几乎不可能以完全意义上的“孤岛”形式生存和演变，总是不可避免地与其他文化相遇。何况，在信息盈盛的时代，各个民族间的文化隔墙很容易被冲破。德朗迪(Gerard Delanty)把各种文化相遇的必然性称为“遭遇论”(encounterism)，“文化差异观念的背后是一个更深刻的文化遭遇的观念”。<sup>②</sup>每一种文化的大发展都是与外部文化相逢后，发现相似或差异从而激发自我变革的成果。各个文化主体在与其他文化发生冲突并将矛盾内化的过程中，自觉地开展自我认识，不断澄清自性要素，完善自我并升级。这种遭遇后的积极转变，使文化冲破了闭合态(closure)，在动态的开放性(openness)中达成自我的同一性(认同)。借助接纳、修正、演进等方式，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ity)由“异”不断趋同，文化的“内部”与“外部”交织互动，互相塑造、成就，边界也随之消解、模糊，最终他中有我，我中有他，实现一次又一次“外部的内部化”和“无外”(all-inclusive)的文化关系。这种“无外”的世界体系，在弥合文化矛盾的同时，对待一切外来者和相异者，都将其视作可吸纳的元素，主动“拿来”发展自我，“把互相冲突的国家、宗教或文明都变成世界的内部关系，从而消除不可能兼容的异己外部性”<sup>③</sup>，推动世界关系的和谐共生。这样的世界格局和文化系统使每一个个体都得到了发展，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可欲性(desirability)。

新型天下观衍生出某种理想状态下的国际秩序及其国际关系理论，谓之“天下体系”“新天下主义”或“新世界主义”(neo-comopolitism)，其理论核心是承认并尊重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地位，倡导和谐交往，反对文化自大主义、文化沙文主义。在和谐大同观念下形成的这种世界格局，超越了传统理论中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两个基本维度，倡导构建“第三政治理念”，即全球政治，将国际关系升华为“天下一体”的全球观。这一点十分重要。实质上，它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进行了非常有力的理论诠释。如果用一句话简单概括这个宏大理论系统的核心，那就是在“无外原则”下倡导“一种兼容的普遍主义”，不仅仅从利益诉求出发解决问题，而且是在诉诸“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找到从普遍冲突向普遍合作发展的可能性。<sup>④</sup>这个观点为重新确立当代对外传播的指导思想起到了重要的启示作用。

社会经济学中有“帕累托改善(或改进)”的理论设想，即社会总福利获得增长而没有一个人的利益因此减少。但这个设想的机制无法缩小贫富分化，化解社会冲突。而新天下观提出的“孔子改进”要求所有成员的利益真正共轭相连，休戚相关，每一个个体的利益得失，就是所有成员的利益得失；所有成员的功利所求，也会引发每个成员的利益盈减结果。这个思想正是源自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关系哲学，为新天下主义的理想世界秩序做了最佳注解。

## 2. 对外话语与国际传播的新思路与新方法论

从功能上，对外话语可以分为专门性对外话语和战略性对外话语。前者指导某一具体领域的外事工作，如外交事务，它只对局部的对外交流产生影响；后者则有其明确性、统摄性、全局性、目标性和中

① 刘擎. 重建全球想象：从“天下”理想走向新世界主义 [J]. 学术月刊, 2015, (8): 5-15.

② Gerard Delanty. Cultural Diversity, Democracy and the Prospects of Cosmopolitanism: A Theory of Cultural Encounters [J].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1, (4): 636, 640.

③ 赵汀阳. 天下：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 [J]. 争鸣, 2019, (9): 100-108.

④ 赵汀阳. 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4.

长期性。<sup>①</sup> 关于专门性的对外话语，较多依赖的是外交部门在国际事务中所使用的官方语言，思维方式上也倾向于以国家利益为指挥。这种话语特征和内涵与战略性对外话语有较大的重合，因此风格上偏向严肃、庄重与宏大。新型天下观则认为，世界体系表面上看是个政治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精神品质问题。<sup>②</sup> 也就是说，无论是以哪种形式运用的对外话语，所面对的国际关系构建问题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根本上就是一种文明的对话和意识的交流。新天下主义的全球文明观，就是无论在专门的国际对话中，还是在战略性的对外交流中，最终都能在自我发展的同时实现“立人达人”。这其中的根本就是各国人民之间文化上的交流和智识上的对话。<sup>③</sup>

此外，在过去的对外传播理念中，“以我为主”“从我出发”是一个基本出发点，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由我主导”“主动推介”“向外输出”为核心的文化传播思想。可以看出，这种从“我”出发的传播理念，明显有着内外分别的文化立场，更多地还是一种“推销员”式文化观。尽管在对文化传播理念和行为所作的解释中，也强调避免过多的主观性，应尽量考虑双向的社会需求，但其理论内核的外向行为指向依然明显，营销意识不免存在，难以充分兼顾移植产品、递送文化和对外话语产生的嫁接效果及落地之声。这种“输出者”的姿态使我们主观上容易忽略传播产品（包括传播话语）的后期效应，对受众的反应重视不够，这也使我们的对外合作动机在一些国际场合遭遇了外方的猜疑，不时处于被动回应的境地。另外，这种眼光向外的传播理念使我们较少关注传播行为的“文化回带”效应（culture-retrieving），即通过对外传播活动来反向观照我们自己的社会发展，在向外传播的同时，也主动吸纳他者的文明成果，援用外方反馈（主要指社会效益与公共意见）所产生的后传播力（post-promoting force）来推动国内的变革和发展。

新天下观将我们同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其他文化真正视作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认识到共生世界里“不存在绝对的超越存在”“对于任何他者都有办法化为和谐的存在”<sup>④</sup>。在新世界关系中，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具有世界中心的地位，也无绝对的主次之分。这个体系下的所有成员都是平等的，有着“利益共轭”的关系。任何一个成员，无论是思想成就还是文化成果，都是人类共同的财产，应当为所有成员共享。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也体现了新天下主义的世界关系愿景：顺应时代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凝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共识，共建各族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共同体。<sup>⑤</sup> 这是一种新的全球景象：它告别文明中心论，终结霸权轮替的历史，走向一种基于跨文明对话与合作的世界秩序。

中国的文化精神中历来承载着深刻的社会关系维度，强调任何个体的发展都离不开群体和环境。单个的社会单元（如个人）必须通过与他人的互动学习才能成为完整意义上的个体（人）。“一个个体要想成为充分意义上的人，只有通过与其他人的互动；在这个意义上，‘主体间性’先于‘主体性’。而与他人的互动首先就意味着成为一个成熟的人，或者说，意味着一个学习的过程，一个学习成为充分意义上的人的过程。”<sup>⑥</sup> 这个思想形成了新天下观里对国际关系的独特认识，即：国际关系就是社会关系，也是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在一个共同体内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关系。在新天下的世界里，“人们”无法做一个“原子化个人”“诸文化”也不能是“孤岛文化”，所有成员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并且改造彼此。你的存在成就着我；反之亦然。

① 叶淑兰. 中国战略性外交话语建构刍议 [J]. 外交评论, 2012, (5): 68-81.

② 赵汀阳, 王家范, 等. 天下体系与未来世界秩序 [J]. 探索与争鸣, 2016, (5): 52-54.

③ 柯岚安. 中国视野下的世界秩序：天下、帝国和世界 [J]. 探索与争鸣, 2008, (10): 49-56.

④ 赵赫. 新天下主义：一种世界秩序构想的论争与启示 [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21, (3): 38-54.

⑤ 张锐. 现代化进程中的理与势：天下主义及其建构 [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3): 16-21.

⑥ 童世骏, 陆丁. 中国思想与对话普遍主义 [J]. 世界哲学, 2006, (4): 77-83.

在这种世界观念下，对外传播不应以文化输出为根本目的，对外话语中也不能只谈“我们主张”“我们希望”。这些概念里的“我们”还是我方的代名词，暗示的还是中方的价值判断，而不完全是从他国实际出发的同声呼吁，同气相求；至少外方可能会作此疑虑之想，猜疑中方可能怀有某种利益上的动机。我们的对外交往应该多立身于共同的问题立场，共同的利益基础和共同的发展目标，开展坦诚而广泛的对话，使对外交流变成一种互惠共赢的双向式、多向式关系行为(bilateral/multilateral relational deed)，真正践行命运共同体的关系实质。以往的国际交流经验证实了一个道理：过多强调“中国式”的思想价值和行动方案，并不能顺利得到国际社会投来的信任票。其中一个原因或许就是过于在意宣扬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历时性(悠久文明史)，没有下力气挖掘其中的利他性和共时性价值。因为只有当我方的文化姿态与其他文化同处于一个命运平台，在一个时间域下，才能真正开展对话，相向而行。这就要求我们放低主位意识，甚至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淡化一些“对外”的话语符号，建立共同话语的机制。这便是对外传播和对外话语在新时代的一个总体思路。

### 三、中国对外话语优化表达的路径与方式

有了新天下观为指导的国际交流思想，新时期、新形势下的对外话语方式还需要形成一个自洽的方法体系。我们可以从顶层设计出发，不断推演和完善具体实施方式，以优化话语的表达路径。

#### (一) 宏观：建立对外话语的方法论体系——以天下观为指导的关系理性

现代的个体理性往往把利己性作为优先选项，这种价值定位甚至在国际关系中转化为一些领导集团的国家行为意志。这种以私利开道的行为主义很难公平对待异己，也很难公正处理国际事务，其对外话语的主导思维是唯我独尊、一家为大的。西方文明中倡导的“个性主义”(individualism)虽能放大个体的生存形态，但因其容易滋生自大的意识，对个体成长空间的抑制作用也是明显的。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一旦失去了对他者的观照，便会限制外来机遇对自身的成长刺激作用。此外，一些西方国家奉行“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行为对等原则，表面看是利害因果的正常逻辑，实际是借助“信义”的外衣包裹着他我对立的关系原则，投射出不容“德化”的关系治理理念，可能隐藏了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与世相争、物竞天择的竞争意识和对抗态度。从根本上说，其核心仍然是以“利”字当头的价值观。这种观念迫使我们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既要有充分的认识准备，有能力去应对尖锐的矛盾，也要有超越性的思想格局。

新型天下观将全球总福利的最大化作为最高目标，把友好互利的国际关系、民族关系、文明关系视作世界和谐体系的基础。对外交往的远大目标就应该是与世界各地人民一起共建一个超越分歧，和谐共存(coexistence)的“新天下”“新世界”。它的“无外原则”就是要从根本上消除对立意识，消除利益的纠葛，消除“我”与非“我”的分化态度，而更加积极地融入世界、包容世界。“融入”，是向外的行为要求；“包容”，是向内的行为要求。这种开放、包容的行为方式正是我们开展对外话语的总体态度。这里需要强调，对待世界的开放和包容，并不意味着要丧失本我的自性特征，尤其是自主性。我们欢迎的天下不是以“我”为中心的天下，但必须首先是有“我”的天下。所以，在处理国际关系，开展对外交流时，中国特色、中国品格和中国形象是要坚持维护的，因为中国就是新天下秩序的一份子。不过，在有些学者眼中，中国能扮演的角色决不仅是一个普通的天下成员，而“将是这种新天下格局的主要缔造者，至少是有力的推动者”。<sup>①</sup>进言之，新天下观为我们在新时期的对外交流构建了一个更加宏大的世界观，形成了一个超越旧识、更为理想的关系理性构念。这里也蕴含了对外话语的总体方法论，即：站在命运共同体的立场，以获取最大化信任为前提，谋求共轭利益，对话共同议题，不断以换位思考的方式开展并调整信息沟通。更通俗一点说便是：用“我们”(世界性的、整体的)的眼光去看待共同的家园世界，同时，用“我们”的语言来讲述共同感兴趣的故事，并从“我们”的角度来认识“我”自己(自我的、个体的)。

<sup>①</sup> 赵汀阳. 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 [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6, 27.

## （二）中观：国际传播对外话语的主要路径——贯彻基于尊重的天下共同体意识

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的今天，我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必须以化解矛盾，减少分歧，营造和谐的国际关系为主要目的，而不是简单着眼于向世界宣传自己，宣示我方的存在，这样反而容易与国际环境格格不入，引起误解和冲突。一个有力的保障就是将“天下一体，人类共运”的意识运用到国际交流的实际行动上来，并以此促成与他者的价值共识。

首先，用新天下观阐释好文明“无外”（all-inclusiveness）和世界“内部化”（internalization）的普遍秩序愿景。“无外”并不意味着完全地不分你我，没有个体差异。它的真正含义是：一切差异都存在于互相伤害最小化的关系之中。它的思想内核与“和而不同”的原则一致。在任何一种实现共生的生态中，保持事物的多样性才是良性状态，单极化会被排斥。这个观点已在奎因的“存在论承诺”中被提及：“存在就是约束变元的值”（to be is to be the value of a variable）。<sup>①</sup> 换言之，事物的生命力就在于打破单一性的壁垒。在进行国际文化交流和对外话语时，必须把和谐共生的价值观明确且不厌其烦地进行阐释，彰显为一种基本的国际交往立场，成为对外关系中一个鲜明的价值体现。

其次，在立场表达和对外传播中强调世界主义的关系理性。《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中指出，当前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社会信息化。粮食安全、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网络攻击、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等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对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都构成了严峻挑战。不论人们身处何国、信仰如何、是否愿意，实际上已经处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之中。<sup>②</sup> 而一些国家和地区近年来鼓吹的民粹主义，以及不断出现的反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等极端思潮，正在破坏全球秩序，损害国家间、地域间、民族间和文化间的关系利益。作为表征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话语，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全球治理观等国际交往理念，既是中国智慧的体现，也是对外话语重要的思想出发点。

再次，将“立己立人，达己达人”的胸怀作为应对国际关系，阐发对外态度的一个基本动机。也就是用“行大道，利天下”的思想来处理国际关系，与四方友邦齐头并进，用国际担当的大国姿态推动全球化建设，帮助各国人民实现同一片蓝天下的携手发展。对外话语中，在对方愿意接受的前提下，可以适度放大“达人”的效果，让利于外，甚至可以不图回报地在某些领域（如基建、文教事业）开展合作，因为真正理想的国际关系不是以眼前利益为纽带编织起来的。有时候，关系也是生产力。不过，关系也是国际舞台上最不稳定的因素，在难以把控的时局面前时常表现得很脆弱，需要用对话、交流去大力维护。

最后，打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对话空间，走出舆论困境。长期以来，中国将对外传播机制视为主体对客体的“独白”过程，希望依靠单方面“运动式”外宣来改善国际形象。<sup>③</sup> 然而，世界性的共同体价值观并不是先验性的，也不可能由某国或某种优势文化强加界定，独力建构而成，而是国际交往中各方彼此影响与学习、相互竞争、开展文明对话共同创造出来的。哈贝马斯等学者倡导多样文明开展丰富对话以获得生存和发展。<sup>④</sup> 从建构主义理论出发，互动是一种根本性的建构行为，是共有观念、身份和利益形成的前提。在文化交流中，对话的实质就是一种观念互塑行为，是实现价值点重合的必要手段。因此，对话中要有足够的自信，也要有主动性、引导性和吸引力。通过新概念、新观点、新范式等多种

<sup>①</sup> JANSSEN-LAURET, F. Meta-Ontology, Naturalism, and the Quine-Barcan Marcus debate. In Quine and His Place in History [C]. Gary Kemp and Frederique Janssen-Lauret,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146.

<sup>②</sup>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 [R]. 2011-09-06.

<sup>③</sup> 冯若谷. “身份互塑”与“关系文化”——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视野下的对外传播观 [J]. 现代传播, 2015, (5): 51-54.

<sup>④</sup> KRATOCHWIL F. V. Rules, norms, and decisions: on the conditions of practical and legal reason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affair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56-88.

突破性窗口，让中方在国际交往中赢得特别的关注和尊重，进而获取优势话语权。

### (三) 微观：积极打造受用天下的“入世”话语——突出话语的文化工具性

在天下观的指导下，一切文化成果都是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能够在文化个体中间和整个文化系统中发生动态转化，具有内生动力和扩延效果。国际话语是对外交流的主要方式，是国际秩序中信息沟通、文化传播、增进智识的基本手段。话语不仅是表达的工具，也是文化存在的形式。而且，话语本身就是文化，还能生成文化。借助语言工具走进国际社会生活时，话语的文化特性也随之传向外面的世界。因此，话语的使用也要有足够的文化构建意识，要考虑到话语的文化实体作用和“入世”效应，而不能只顾及自我的交际需求，忽略话语的文化传播潜质。以下 4 个方面可作为中国对外话语文化建设及具体实施的主要行动细节。

#### 1. 主动开展国际传播和对话的议程设置

长期以来，我国对国际传播议程及话题事项进行主动设置的意识不强，导致很多国际上的涉华议题牵着我们的鼻子，卷入西方媒体和权力机构设计的一些敏感问题，不得已被动采用回应机制进行修补、说明，导致“有理说不清，说了散不开”的局面。我们应该从世界政治需要出发，以中外关系的互利性为基础，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和真实面貌，主动设置一些积极议题进行引导，加以阐述、商议或研讨。这里涉及议程设置的内容优化与充分性、发布时间前置、话题视角有战略性引导等具体维度。新世界主义愿景中的国际秩序将摆脱单边模式，向多边方向不断完善。因此，国际议程设置也应朝这个方向进行强化。譬如，借助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和实践，抓住多边交往、共创和谐世界的主题，扩大合作社区，开展政治、经济、科技、人文的全面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把中国立场、世界眼光和人类情怀的人文主题及和平发展的关系主张进行深度阐释，从而巩固我国的国际信誉，树立良好的国际伙伴形象。

选择优质的传播内容应成为议程设置的重点。一旦某个问题转化为特定的国际化议题并进入交流程序，对外话语的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就将开启。正如巴赫金所说，“实际上，我们任何时候都不是在说话和听话，而是在听真实或虚假，善良或丑恶，重要或不重要，接受或不接受等等。话语永远都充满着意识形态或生活的内容和意义。”<sup>①</sup> 对外传播的话语中不能只有严肃的倡议、声明和解答，还可以有动人的讲述，应加大文化内涵的传递，“不断挖掘中国故事的内在价值，通过内容传播树立中国的大国形象”<sup>②</sup>。主流媒体除了宣传国家传播的大政方针，开展宏大的时代叙事外，还可以增加一些生动有趣的故事，突出典型化的中国社会符号，反映真实的民风国情，利用权威资源和地位可靠解读中国文化的理念与智慧。

#### 2. 构造全天候的传播平台矩阵

现代科技和媒体技术的发展把人类快速带入信息时代，每个人都成为了 Presumer，即大数据的消费者 (consumer)，同时充当了信息的生产者 (producer) 和传播者。这就突破了旧时平面媒体、主流官方媒体的传播模式，人们可以借助现代通讯工具和移动设备，更加自主地选择感兴趣的内容和传送形式，随时随地消费信息，品味文化生活。因此，采用“平民化”“草根性”视角来看世界，以质朴的语言讲述中国故事，更容易受到普通大众的欢迎。中新社的“庖丁解 News”“小新 Talkshow”等节目就很受海外民众欢迎；疫情期间，《人民日报》的专题纪录片《生死金银潭》在海外推广受到了网友的大量点赞、评论和转发，使海外民众了解到中国抗疫的真实故事，赢得了世界的尊敬。<sup>③</sup> 在大众喜爱的短视频上，有不少海内外华人及爱华友好人士创作了丰富多彩的作品，介绍中华历史人文、当代中国社会和民众的真实面貌，在国际网络平台推送分享，有力反击了西方媒体对中国现实的抹黑和不实报道，以民间力量推动了中国形象的正面传播。基于此，国际大社区中的发声方式应该多元化，细分受众，侧重话语内容的针对性，

① 巴赫金全集（第 2 卷）[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416.

② 孙吉胜. 加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挑战与方向 [J].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2，(3)：1-20.

③ 白祖偕. 新形势下主流媒体如何构建对外传播话语路径 [J]. 新闻文化建设，2023，(8)：35-37.

以满足不同主题、不同传播目的、不同对象人群的需求等，打造传播平台的上下联动（官媒+民媒）。同时，加强媒体的本土化运营，提高我国对外话语体系的落地入户率，将外来的内容变成当地民众所能接触的一种生活日常。这些做法与“天下观”中个体成员普遍联系，行为利益互动的基本认识是一致的。当然，也应确保网络语言在积极轨道上运行，保障网络安全和国家安全。<sup>①</sup>

另外，零星、碎片化制作的节目在传播效力上不如专题式和组块式节目好，原因是这种节目易于湮没在信息潮中，很容易削弱内容的时效性。以内容集块和信息连续体的方式推送效果远比散制式节目作品要好。因此，建议各个平台、节目组、媒体人彼此关联合作，媒体融合发展，打造当代的中国故事，丰富叙事手段，“你说我讲，你做我推，我推你送，共话心声”，形成信息联动的媒体矩阵和传播链，便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传播内容的持久力和影响度，真正朝着义利统一、天下大同的目标努力。

### 3. 传播队伍的复合式人才建设与学科支持

对外话语作为一种交流工具，真正使用者是传播人才。国际交流中，传播者不免与各种社会部门接触，需要广泛获取国情资讯、行业信息和支持。这时，使用对外话语的传播者承担了信息终端和发布者的作用，更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开拓的国际视野、高度的文化敏感性、丰富的涉外经验和危机公关能力。一般的人才培养目标是打造见识广博、专业精深的“T”型人才，但国际传播人才将要面对的业务领域常常不是单一化的，需要有扎实的语言素养、文化素养、政治素养，以及多种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因此，在人才素质的要求上应该是呈梳状“π”的能力结构。但是，让一个传播者个人具备所有的业务能力是不现实的，这样高要求的通才式人才培养会加大教育成本，在时间成本和任务效率上也是难以允许的。因此，除了对个人能力素养提出复合式的学科知识背景要求外，一个比较实际的做法是将传播队伍的结构多元化，吸纳各方传播力量，形成复合人才梯队。例如，除了新闻界、文化教育界人士及外宣部门工作者以外，还可以借助社会精英、民间权威机构、自媒体人、文艺工作者等社会影响力较大的人群，为我国的政治文化宣传做出积极贡献。同时，还需要加强外宣人才智库的建设，储备充分的人力资源和智力支持。

### 4. 优化国际话语的语言工具元素

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控制的国外政治舆论场，我们对西方世界鼓吹的“普世价值”意识形态，以“自由”“平等”“民主”为幌子的价值宣传已不陌生。这些话语几乎垄断了民主的定义权、民主标准的制定权、民主模式的主导权，以及民主是非的裁定权，极力宣扬与资本主义联姻的西式民主，布设了大量的民主理论陷阱，如民主万能论、民主终结论、选举至上论等。<sup>②</sup> 新“天下观”的启示是：国际秩序下的意识矛盾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并不是不可调和转化的。孔子“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提供了一个思想寓理：在不利环境下必须坚持正义，保持自我本性，敢于迎面而上，从而修正环境的错讹因素。因此，对外话语中应该有针对性地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思想与价值观，如“自由”“平等”“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和平发展”等。运用好话语符号就是对外交流中最有力的价值表述方式。

2021至2023年，习近平主席连续提出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和全球文明的三大倡议，正是中国倡导全球治理观的集中体现，为“全球文明交流互鉴问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和方案”<sup>③</sup>。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的主旨讲话中，提出以“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为主要内容的全球文明倡议，用4个“共同倡导”体现了中国视野下维护全人类文明发展的博大胸怀，以全球化大家庭成员的文明关切倡导各国把握认识和评价自我文明的自主权与主导权，对“文明隔阂论”“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论调做出了有力的批判与回应，再度阐明了中方“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

<sup>①</sup> 周正履，全文宁. 安全视阈下的网络语言问题研究 [J]. 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 2022, (1): 11-19 + 121.

<sup>②</sup> 陈曙光，刘影. 西方话语中的“民主陷阱”及其批判 [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5, (2): 66-72, 93.

<sup>③</sup> 保建云. 三大全球倡议的理论境界与深远意义 [J]. 国家治理, 2023, (18): 2-7.

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的鲜明立场，同时也表达了“携手共行天下大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的真诚愿望。<sup>①</sup>以此为例可知，话语符号对于思想主张的阐发和文化传播的内容提炼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其价值书写的工具意义尤为明显。

#### 四、结语

一种文化的生命力不只体现在它在历史视野中产生过的社会影响力，更多取决于它在当代与未来时域中的存在意义，尤其是在现时语境中能否进一步完成社会化的转型发展，并衍生出新的思想价值。从内外双重文化视域来看，中国传统价值观既可以解释当代中国在国际生活中的行动主张和政策背后的逻辑，也可以阐释中国实践的合理性。中华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也是中国新时代外交和国际关系话语的精神内核，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最具中国独创精神和特色的要素。<sup>②</sup>新天下观就是中国传统思想内核在全球视野下萌生的一个思想系统，是中国文化为全球文明发展贡献的一个重要观念。它以哲学思辨为基础，以国际政治和文化交流为切入点，对新型世界格局、国际关系做理想化的构想，从而对现实中的国家间行为、民族认识、文化态度等勾勒出深刻的思想导图。

对外话语是整个蓝图中重要的实践工具。在天下观形成的理念基础上，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话语权（discourse right）和话语权力（discourse power）的差别。前者主要是对应得权益的一种呼吁、索取和捍卫，这是我们从弱国走来的过程中，一直试图在国际社区中取得的基本生存条件。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在面对不利甚至不公的国际环境时，更应该积极主动地培育、发展并运用同我国实力及地位相匹配的话语权力。这个重要的行为转变不仅仅是对一国权益的合法争取，更是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立场，对维护正常国际秩序、构建良性世界关系格局提出的一种必然要求，是对未来全球文明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支持。

### China'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and Communication with the Tianxia Concept in New Global Situation

LI Zhil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504)

**Abstract:** In the face of the increasingly complex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today, China's foreign exchanges on the world stage are facing a series of severe challenges, and it urgently needs to develop strategies that are appropriate to address issues such as foreign discourse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new "Tianxia Concept" derived from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its unique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has opened up new ideas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order and handl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 also provide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nternational dialogu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The theoretical spirit of the "Tianxia Concep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basic idea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iming to achieve the common interests, harmonious relationships, and joint development of people from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Starting from the governan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aiming for the coexistence of civilizations, it takes political life and cultural relationships as the focal points and designs a systematic work pattern and implementation plan for China's foreign exchanges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New Tianxia Concep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foreign discours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pproaches to express

(责任编辑：杨恬)

① 景向辉. 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三大倡议”：引领世界潮流浩荡大势 [N]. 北京日报, 2023-06-19 (11).

② 黄乐平. 新形势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 [J]. 对外传播, 2023, (4): 66-70.